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

断裂与整合

王选庆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

断裂与整合

王选庆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断裂与整合——王氏信用制度理论体系的实践透视/王选庆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4

ISBN 978-7-5426-5095-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金融学—研究—中国
IV. ①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3442 号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断裂与整合——王氏信用制度理论体系的实践透视

著 者 王选庆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28.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095-5/F·707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前 言

上中学的时候最喜欢两门课程,一是语文,二是化学。语文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囊括了文史哲,它让人思接千载,目观八方,既能借物咏怀,抒情达意,又能洞察人性,知人论世。^①化学是自然科学的精髓,它既向我们展示了物质世界的奇妙,又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思维的奇妙。物质世界的奇妙自不必说,体现在化学中的人类思维的奇妙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元素思维。世界上无数种物质,都可以归结为大约 118 种元素的组合变化,而这 118 种元素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竟然还遵循元素周期律。甚至连数学中的素数概念都包含着元素思维的思想,著

① 黑格尔说:“思想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语言里。人兽之别就由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须常常记住。语言渗透了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渗透了成为一般观念的东西,即渗透了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而人用以造成语言和在语言中所表示的东西,无论较为隐蔽、较为混杂或已经很明显,总包含着一个范畴;逻辑的东西对人是那么自然,或者不如说它就是人的特有本性自身。但是,假如人们把一般的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而与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那么,人们一定会说,逻辑的东西倒是超自然的,它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并从而使自然行为在根本上成为人的东西,成为观念和目的,即使这仅仅是形式的。”(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8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语文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这句话的经典论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诗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中,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前面所讲,诗人的职责已经很清楚,他不是去描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去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写作,另一个用韵文写作。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在这种修辞的格式下,它也是一种历史,并不比它没有韵律的时候差。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更值得认真关注。因为诗所描写的是普遍性的事实,而历史讲述的是个别事件。”(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5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文史哲三者水乳交融关系的经典表述。

名的黎曼猜想,说穿了,无非就是关于数学中元素周期律的猜想。二是样品提纯思维。如果样品的纯度不够,或在实验过程中样品被污染了,就无法得到预想的实验结果,所以样品的提纯至关重要。化学中的样品提纯思维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思维是相通的,抽象度可以类比如样品纯度。三是化验思维。通过对极少的样品的精密化验,就能获得关于总体的丰富而准确的信息。四是指示剂思维。通过指示剂,使处于临界点的微小变化或难以观察的变化或区别变得一目了然,测量弱酸弱碱的试纸和试剂是大家所熟知的,被称为染色体的DNA就是通过荧光染色法从难以观察的无色透明状而变得一目了然的。道德风险控制既是金融管理的重中之重,又是金融管理的难中之难,指示剂思维对于道德风险的识别及其报警装置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五是复杂系统^①不同涌现层面的层级思维。虽然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论是

① 在笔者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把“大数据”与“复杂系统”人为地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要么是“脑残”的表现,要么是骗人的幌子,二者必居其一。因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早就宣判了这种做法的死刑。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直观解释就是,数学不是万能的,数学只适用于机械性、量变性的简单系统,不适用于具有涌现性、质变性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不同涌现层面的元素是异质元素,而数学只能处理同质元素之间的关系。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对数学万能论迷信的毁灭性打击,又是对那些沉迷于数学万能论迷信的可怜的灵魂和那些用数学万能论迷信掩盖自己的无知的可耻的灵魂的救赎。关于系统的一级分类是,根据系统是否具有涌现性、质变性特征,把系统分为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复杂系统的不同涌现层面只有在归约化为不同的简单系统之后,才能用数学进行处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定量分析以定性分析为前提的原因。简单系统是最笨的人脑和非人的电脑都能掌握的人类智能,而复杂系统是人类中的天才经过但丁所说的地狱和炼狱的历练之后,进入天堂时才能略窥其一二的“神的玄机”;前者是数学的领域,后者是哲学的领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哲学,由于它要成为科学,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入关于系统的二级分类,即简单系统可以根据其数据特征,区分为“大数据”简单系统与“小数据”简单系统。一个简单系统,无论它的数据是海量数据还是痕量数据,都不会改变它作为简单系统的性质。而一个复杂系统,在归约化为不同涌现层面的不同简单系统之前,任何关于它的数据,无论是海量数据还是痕量数据,对于凡夫俗子的眼睛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一片漆黑,对于凡夫俗子的耳朵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一片盲音。异质系统是不相容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转下页)

近些年才提出来的,但在化学思想中很早就体现着复杂系统不同涌现层面的层级思维。物质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原子层面的无机化学与经典力学的质点思维是相通的,亚原子层面的放射化学直通关于宇宙起源的量子力学,分子层面的有机化学直通关于生命起源的以DNA大分子为核心的分子生物学。六是实验思维。化学实验不是炼金术中的盲目实验,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理论推断也只有经过实验验证才能确立。七是对称思维。化学与群论的结合,不仅给化学带来一场革命,也使人们对数学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数学原来是一门关于对称的科学。在做梦的年纪,既做过文学家的梦,也做过化学家的梦。

1981年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之前,看了一场电影——《陈毅市长》,反映上海刚刚解放时陈毅在百废待兴的上海的出色工作,其中有一段情节恰好切中了我的兴趣点。这段情节讲述的是有一位留学归来的生物化学家,屡次建议国民党政府设厂生产国产的盘尼西林,都吃了闭门羹,于是心灰意冷,闭门读书,并且在书房的墙壁上贴上“闲谈不超过三分钟”的字幅以拒绝官场应酬和媒体骚扰。陈毅市长为了在三分钟内说服这位生物化学家出面主持新中国的盘尼西林生产,采取了“请将不如激将”的办法,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在三分钟的时间快要到时,他说了一句:“先生,你虽然是化学专家,但有一门化学你一窍不通。”说完就要离开,这位生物化学家被这一句话给打懵了,非要弄清楚他究竟对哪一门化学一窍不通,于是打破“闲谈不超过三分钟”的戒律,非要让陈毅市长说个清楚。于是,陈毅市长侃侃而谈:“这门化学

(接上页)说的“狗看星星一灿明”、“对牛弹琴”、“隔行如隔山”、“富人想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句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引起广泛的歧义理解的直译过来的西方话,若用正宗的汉语来进行意译翻译,似乎应该是“对于那些问饥民们‘何不食肉糜’的反动透顶的反革命或身上连一滴人血都没有的吸血僵尸来说,要理解饥民们为什么要暴动和革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和“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道理所在。可见,把“大数据”与“复杂系统”扯在一起,是犯了逻辑错误。

就是社会变化之学。……”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最喜欢的两门课程竟然有相通之处:化学是物质变化之学,而语文中包含着社会变化之学。^①

在现代元素思维产生之前,化学是由经验、迷信和诈骗相混杂而成的炼金术^②。是元素思维把化学与炼金术区分开来,使其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科学。以在1936年出版专著《鲁迅批判》而闻名于世并因此而饱受摧残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说:“什么是科学?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所研究的对象,而在研究时所持的科学精神、科学头脑、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求真,科学头脑在分析,科学态度在客观,科学方法是实验和严密的推理。是这样,就是科学;不是这样,就不是科学。”^③如果把人类社会也看作一个复杂系统,那么这个复杂系统不同涌现层面的元素是什么?这些不同层面的元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社会变化之学虽然被陈毅元帅说成只是“化学”中的一门,但它却囊括了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要把元素思维贯彻到社会变化之

① 中国唐末五代谭峭所撰《谭子化书》把世界的变化分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和俭化。主张本齐物以言道化,本虚无以言术化,本无以为言德化,本道德以言仁化,本税多民饥以言食化,本见素抱朴以言俭化。《谭子化书》就是把自然哲学与政治—道德哲学共冶一炉,堪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相媲美的学术著作。

② 在中世纪的欧洲,炼金术有两种:一种是提炼金属的过程,正当而合法;一种是骗术,用来提炼所谓的“点金石”,歪邪而违法。这里的“炼金术”指后者。在但丁的《神曲》中,炼金术士在地狱第八层第十遭遭受麻风病的惩罚,其中有一个炼金术士这样沾沾自喜地说道:“不过,要是你想知道,一心/跟你抨击锡耶纳人的是谁,请定睛/望着我,我的脸会给你正确的回音;/让你知道,我是卡坡基奥的幽灵,/生时以炼金术伪造黄金的灿烂。/我没有错认吧?你呀,该记得分明,/我模仿自然的功夫是多么精湛。”(参见[意]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地狱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卡坡基奥恬不知耻,以骗术为荣,毫无悔过之心。据说,卡坡基奥是佛罗伦萨人,是但丁的相识,与但丁同学,善于伪装身份,以炼金术行骗,1293年在锡耶纳死于炮烙刑。亡魂因脸上有麻风病的痂皮,不易为观者辨认;不过但丁细加察看,就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把卡坡基奥与当今出版《金融炼金术》一书,鼓吹“金融市场非道德性”的美国人索罗斯相比较,令人不禁慨叹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

③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十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转引自刘月新:《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J],《三峡论坛》(山峡文学·理论版)2013年第4期,第107—112页。

学当中,似乎比老虎吃天还难。不过,与浩瀚无垠的物质世界相比,人类社会毕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人类社会的元素应该比物质世界的元素更加简单。

我是从经济学研究进入金融学研究,又从金融学研究进入保险学研究,反过来,我又从保险学的角度思考金融学,从金融学的角度思考经济学。在我看来,保险学、金融学和经济学不过是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三个不同的涌现层面罢了,保险学是更加基础的涌现层面,金融学次之,经济学则是较为表面的涌现层面。我在不同的层面都在寻找这个层面的基本元素,并且用这些基本元素的组合变化来解释这个层面的一切现象。

本书是把元素思维贯彻到社会变化之学当中的系列试验报告。这项试验的时间跨度很长,它既包括我1988年发表的处女作《略论农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又包括2006—2008年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模型及其在西部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项目编号:70563001)的系列承诺论文,还包括项目结束后进一步的后续研究,如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断裂与整合》。学术论文《中西方传统文化对比中的学术信用问题》,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管理:断裂与整合》一文第三部分第二小节里中西方传统文化社会伦理层面比较的部分内容,但由于篇幅太长,只好抽出来单独成篇。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一方面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称思维解决西方传统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的分裂问题,另一方面又运用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确思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对称思维对于对称原点和对称轴线的忽视问题;在此基础上,穿越古今中西,对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或人性的终极问题进行探讨。也许是由于这篇文章的语言太生动了,使人们只看到它外在的生动语言,反而忽视了它内在的学术思想。从研究内容看,本书第1至19章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第20、21、22、23、24章分别是对金融行为信用、司法信用、

政府行为信用、学术信用、中央银行信用的研究,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层层递进的信用研究系列。在2014年3月1日举行的上海市信用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诚信上海”信用创新论坛上,作者应邀做了题为“从学术信用到工商企业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层次性”的简短发言,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工商企业信用,问题表现在工商企业身上,但问题的根源在整个社会身上,用基督耶稣的话说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第二,诚信、信用、信用制度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如果不能严格区分这三个概念,就不可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思维。第三,没有诚信和信用的经济是诈骗经济,但仅在诚信和信用概念基础上充其量只能建立起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经济即“格里昂经济”^①或“夏洛克经济”或“黄世仁经济”,只有在信用制度概念及其实践表现——最大诚信原则(The Principle of Utmost Bona Fide)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代金融经济,因为金融的本质就是而且只能是信用制度。诚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言:“为了揭示真理而驳斥谬论,并无多大好处。一俟真理通过正确的推论,从它固有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一切违反真理的东西即使不加以明确反驳,也必定是错误的。如果为了获得一定了解,而鸟瞰全部必经之路,那么也很容易发觉哪些是偏离这条道路陷入谬见的歧途,并且很容易向每个迷途者十分肯定地指出他由以误入迷途的出发点。因为任何真理都只能从一个基本原理推导出来。每个特定的课题应当有什么

① 在古希腊神话里,格里昂(Geryon)是克律萨奥尔和卡利洛厄的儿子,有三个头颅,三个相连的身子,住在西班牙的伽得斯,与赫拉克勒斯门柱相距25英里。格里昂有许多牛群,由双头狗奥尔特洛斯和牧人欧律提翁看守。赫拉克勒斯的12件苦差之一,是抢走格里昂的牛群。为了完成这一苦差,他到伽得斯扼死了格里昂、奥尔特洛斯、欧律提翁,最后抢走了牛群。据中世纪的说法,格里昂喜欢诱人作客,然后把客人杀死。在《圣经》中,格里昂一怪而具三性(人性、兽性、蛇性),是上帝三位一体的扭曲。在《神曲·地狱篇》第17章里,但丁借维吉尔(象征理智)之口,对作为关押在地狱第七层的放高利贷者的阴魂即欺诈之象征的格里昂进行了描述:“啊!看眼前这头尖尾的野兽。/它可以穿山、破垣、摧毁刀斧。/啊,就是它,使天下玷污蒙垢!”参见[意]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地狱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基本原理,这是由一门彻底的知识学所必须阐明的。怎样从这个基本原理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这是由普通逻辑指明的,因此,无论是正路还是歧途,就都很容易予以查明。”^①第四,信用制度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是两回事,前者是更基本的东西,后者是更表面的东西。第五,在信用制度理论基础上,仿照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即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只有每一道工序的半成品是合格的,最终的产成品在质量上才可能是合格的),可以提出全面信用管理的概念。依据全面信用管理的概念,可以提出作为全面信用管理基础性工程的社会信用体系层次性概念:第一级是学术信用。学术生产基于公义的是非标准和对公义誓死执著的人,没有基于公义的是非标准,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规则,没有对公义誓死执著的人,任何规则都如同儿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说:“人类如果德行完美,会是万物之灵;同理,如果偏离律法、公义,就是万恶之最,因为他有理性为武器。”阿奎那在《〈尼可玛可斯伦理学〉解读》一书中也说:“一个坏人为恶,可以万倍于禽兽,因为他有理智,可以用来想出各种罪恶。”^②学术以公义为出发点,以真理为归宿,公义标准和真理标准是学术信用的行为准则。用费希特的话说就是:“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社会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

①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页。

② [意]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地狱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①第二级是政府行为信用和中央银行信用。从风险理论的观点看，无论是官员的贪腐，还是商人的金融诈骗和商业诈骗，无非都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德风险恶性事故。之所以把政府行为信用与中央银行信用并列，是因为就像用密封舱原理控制船舶漏水沉没风险一样，基于道德风险控制的需要，现代信用经济是五权分立的经济，即学术、立法、行政、货币、司法五权分立。其具体机制是，学术影响舆论，舆论影响民意，民意形成立法，立法形成行政、货币和司法的运行规则，行政、货币和司法的运行规则规范金融运行，金融运行规范商业运行。公义标准既是政府行为信用的行为准则，也是中央银行信用的行为准则。第三级是司法信用，匹配原则是其行为准则，即最大诚信原则与金融行为信用相匹配，诚信原则与商业行为信用相匹配，不能张冠李戴，相互混淆。第四级是金融行为信用，最大诚信原则是其行为准则。第五级是工商企业信用和消费者信用或统称为商业行为信用，诚信原则是其行为准则。本书的附录《农业建设项目投资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是我在1990—1993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它也是一项元素思维试验，它与第24章在内容上笔断意连，遥相呼应，构成从经济到金融又从金融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任何一项浩大工程，都必须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先造零件，然后组装。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也不例外。本书的有些内容曾以独立成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有些则从未发表过，其编排次序既考虑时间顺序，也考虑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以独立成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时，不同杂志对参考文献标注格式的要求也不同，本书尊重历史和实际，不强行改动，以求统一。本书前后章节的内容或许会有部分重复，但重复的部分在不同章节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①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5页。

这就像水和硫化氢都含有氢元素,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样。或者就像一首乐曲中的主旋律,它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以便在听众的意识里打下深深的烙印。以上这些在别人看来或许是瑕疵的东西,在我看来恰恰是漫长岁月给这项浩大工程留下的美丽年轮,是岁月的风刀霜剑给自己的作品添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讲是人性科学,它的元素只能到人性中去寻找。在我看来,如果说文史哲属于人性采矿学的话,那么金融学就属于人性工程学,金融学的成功取决于文史哲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就像水利学通过修建大坝和水渠,变水害为水利一样,人性工程学通过修建人性大坝和水渠——制度和规则,把人性之恶转化为人性之善。在我看来,如果说光泄露了物性的秘密的话,那么风险就泄露了人性的秘密,风险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像光的概念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保险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量子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1932年7月3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7号上发表《胡适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一文,他说,在中国,大学生走上社会,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两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于是,他建议了三种防身药方:第一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是“你得有一点信心。”个人的堕落属于人类普遍性的个人心灵疾病,基督教思想大师约翰·加尔文也建议了三种防身药方:第一是“自我否定”,第二是“背负十字架”,第三是“默想永世”。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有“人从整体上说只是一种疾病”之说,中国古人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和“上医医国,中医医家,下医医人”之说。国家无非就是根据人性工程学设计和建造的为每一位国人遮风挡雨的人性工程大厦,但破坏容易建设难,人性工程尤其如此。“想烧掉一座城市,有个顽童或疯子足矣,重建它却需要建筑

师、材料、工匠和钱财,尤其是时间。”^①国家之不健全固然是国人的不幸,但它往往首先是人性工程学家和人性工程师的失职、渎职甚至公然破坏。^②“当罪行,尤其是特殊类型的罪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报复的精灵^③就会无情地加快它不知疲倦的飞行。它如同迅速旋转的火把,疾如闪电,能够同时出现在它巨大轨道的所有地方。它同时打击着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有时,这个永不犯错、一贯正确的复仇使臣专门打击特定的民族,把他们浸入血海。别指望他们会努力逃避或减少他们受到的审判。那些有罪的民族,在良心的启迪下,似乎是为了得到救赎而请求和接受惩罚。只要他们有鲜血,他们就将继续奉献。不久,高贵的年轻人就将成长起来,习以为常地谈论父辈的罪行引起的毁灭性战争。”^④关于这段引文中所说的“特殊类型的罪行”,但丁在《神曲》中曾做过非常透彻的分析,他说:“招惹上天之怒的一切恶愆,/都以害人为目的;要达到目的,/就会伤人;手段或粗暴,或奸险。/不过奸险是人类独有的恶疾,/所以更触神怒;因此奸人/在(地狱的)更低处,受更大的痛楚侵袭……向信任者逞奸,则不再依遵/先天之情及后天所摘,/以至由后天产生的信任诚悃。/因此,在(地狱的)最小的一层,也就是/宇宙的中心——冥王狄斯的御座,/一切出卖人的奸贼在永遭焚炙。”^⑤但丁

①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4页。

② 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的那句名言“政府是人性最大的耻辱,对政府的监督是政府最大的耻辱”,其道理恐怕也正在于此。中国唐末五代谭峭在《谭子化书》中所说的“非免戮,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判乱,判乱稟我教”,也有这方面的思想萌芽。

③ “报应”是但丁《神曲·地狱篇》的重要概念,它源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里指出,报应是公理的一种。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提到《圣经》的报应法则(lex talions)时加以引用。参见[意]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地狱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④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6页。

⑤ [意]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地狱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

的《神曲》是西方文艺复兴的鼻祖，西方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鼻祖，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西方现代产业革命的鼻祖。由但丁在《神曲》中关于“特殊类型的罪行”或“人贼分界点”的真知灼见，我们就不难明白著名的“李约瑟之谜”^①的谜底究竟是什么。“李约瑟之谜”的谜底不是别的任何东西，而是中国人对于人贼分界点这一人类文明之根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察和失守。往远处说，都江堰工程可以运营两千多年，而秦王朝却二世而亡，往近处说，由一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迅速垮台，其原因恐怕都在于此吧。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万丈，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泣血断肠，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怀激烈，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命绝唱，从“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踌躇满志，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惨烈国殇，中华民族就像《百年孤独》中的那个被“神谕”诅咒的民族，不断地奋起，不断地抗争，却不断地在“人吃人”的地狱中打滚，在噩梦连绵中轮回。与电影《指环王》中的那枚既具有魔力又泯灭人性的金光灿灿的魔戒的性质正好完全相反，人性工程学的这一千古谜题既是刻在世世代代无数人性工程学家和人性工程师脸上的耻辱和罪恶，又是当今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金融学人和金融从业人员都必须终生背负并且必须世世代代终生背负的十字架。

被基督教视为其“非犹太人的先知”而加以崇拜、被但丁称为他的“亲爱的主人”而由衷爱戴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其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有一个关于“金枝”的寓言。史诗的主人公——古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为了看望他去世的父亲，要到阴间去走一趟。可是，要到阴

① 笔者认为，“李约瑟之谜”与“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揭开了“李约瑟之谜”的谜底，也就同时解答了“钱学森之问”。

间走一趟,又要能活着返回阳世,就必须在地狱的入口、冥河的岸边的漆黑的树林里,找到并折一“金枝”,带着作为他的护身符。对于这一寓言的渊源和含义,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当然有许多事实向埃涅阿斯建议这‘金枝’的观念,但其中无疑有一个最重要。在一首希腊诗里,其创作时期在维吉尔时代之前不久,有一段称柏拉图的作品为一‘金枝,辐射着各种美德’。维吉尔特别以这种方式说道德之善为精神的识别力所必需,精神的识别力又为聪明的和进步的政治家所需。”^①

古希腊先贤柏拉图说:“把自己的教育完全归功于文字的人,只会拥有智慧的皮毛。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恰如人与自己肖像的关系。画家的作品让我们觉得惟妙惟肖,可是一经细察,那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哑巴。文字也是如此,它不知道对一个人说什么,对另一个人隐瞒什么。如果你无缘无故抨击它或冒犯它,它也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它的作者根本不会出面维护它。以为自己仅靠写作就能建立一种明确而永恒信条的人,无异乎大傻瓜。假如他真的掌握一丝真理,他便不会沉迷于这样的想法:用一点墨水和一支笔,他就能让它们在世间生根发芽,能为它们抵御险恶的气候,能赋予它们必要的能力。那些致力于撰写法律或公民宪法的人想入非非,以为既然自己写下这些法律,他也能提供充足的依据并赋予其稳定性,不管他是一介平民还是立法者,不管我们是否明说,他都是在自取其辱,因为他由此证明了自己对灵感与谵妄、正义与谬论、善与恶的性质全然无知。这种无知是一种耻辱,哪怕它得到全体粗俗之人的赞美。”^②

中国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没有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中找到金融学的坐标点,那么,在这

① [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0—11页。

② Plato, *Phaedrus*, XV. 转引自[法]约瑟夫·德·迈斯特:《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9页。

种情况下,任何关于金融学的言说都可以看作是有待澄清的胡说八道。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用“隔离车厢”比喻现代金融学的弊端。熊彼特在其1954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在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演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系统以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政策发生的重大变化,都被人们注意到了,而且有人描述和讨论了它们。但是,“从科学分析的观点看,这些文献是原料,而不是成品。而因为货币和信用方面的‘科学分析家’未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未能加工这些原料,未能依据这些原料来构造其分析结构,所以我们几乎——虽然不是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情况的特征,即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①在这种隔离车厢的情形下,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书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W.巴杰特的《伦巴第街:金融市场的写照》(1873年)和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的意义》(第二版,1909年),它们不仅是为一般读者写的,而且也是为经济学家写的,目的是使人们了解银行业或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及问题。“这些书籍所获得的成功,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表明,尽管人们力图在那些研究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但它们实际上已分离得很远了。”^②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也发现了现代经济学缺乏有机的整体思维,其机械化、碎片化思维的弊端。金融是微观经济组织相互联系的纽带,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关系研究既涉及各种信用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城乡关系。如果说熊彼特关注的是本来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在经济理论中被人为地切割,放置在互不相干的“隔离车厢”中,那么克鲁格曼感到不安和不满的则是主流经济学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互动关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M],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17页。

② 同上书,第518页。

系的视而不见。克鲁格曼在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19世纪冯·屠能的《孤立国》一书曾触及这一问题,到了20世纪又有两门学科即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也都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盲点”。他认为,屠能模型虽然历来受到经济地理学家的重视,但这一模型却是一个片面的模型,“冯·屠能模型着墨不多的正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把你希望了解的事——中心城市的存在——放进了假定。事实上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力量,或称之为‘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创造中心的‘向心’力,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①于是,克鲁格曼构造了一个既包括“离心”力,又包括“向心”力的数学模型,试图把“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在他的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属于“离心”力的范畴,而规模报酬递增和寡头厂商的市场结构则属于“向心”力的范畴。

本书是作者2005年出版的专著《信用制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现代信用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姊妹作。如果说前一本著作侧重于信用制度理论的构造和初步验证的话,那么本书则是对既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应用。本书以信用制度理论为核心,沿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或人性的终极问题这条金线,穿越古今中西,从经济到金融,又从金融到文化,进行全景式深度研究。然而,内容决定形式,正是这种“全景式深度研究”的苛刻要求,决定了本书的整体布局和写作不能采用普通读者习以为常的按部就班、四平八稳、事无巨细、无关痛痒的流水账式方法,而必须打破常规,大胆采用画龙点睛的特写式方法或曰“病灶透视造影方法”,前者就像是脸谱化的中国传统志怪性章回小说,后者就像是洞穿人性的西方现代史

^① [美]保罗·克鲁格曼(1995):《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